【史学新论】

“大历史”: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

隋 福 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针对经济史研究提出了“大历史”概念,回答了可能引起的质疑,通过实例说明了“大历史”视野所具有的价值,并尝试提出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采用“大历史”视野的可能选择。

关键词:大历史;经济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K 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7)05-0043-06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7.05.007

一、引言

在目前的教学和研究中,习惯上把经济史学科分门别类,比如首先区分为中国和外国,然后中国又被断代为古代、近代和现代。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明确研究领域,但这样的“划分阵地”也让经济史研究有“碎化”之嫌,即不习惯于通过放眼整个历史和世界来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而不关注长远历史和宏大背景,那么研究结果可能会有偏差,难以对历史进行深度解释,也难以发现表象之下的规律,而这恰恰是经济史研究需要担当的重任①。

具有“大历史”视野,对于发展经济史学科也有意义。目前,很多人都不愿意从事该项研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史研究的现实指向性不强。如果要关照现实,那么就离不开“大历史”视野。因为只有借助于“大历史”的视野,才能对诸多问题进行有深度的解读,从而让更多人发现经济史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的“无用之大用”,并且产生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兴趣。

对于研究现代经济史的人来说,“大历史”视野尤其重要。因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突出。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情势下,没有“大历史”的视野,可能对问题不会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二、“大历史”的含义

所谓“大历史”,是指以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历史,即在更长的时段、更广的空间内思考和研究问题。更长的时段是对扩大历史时间坐标范围的一个强调,即研究要有更长的历史眼光,即便是研究某一时段的某一事件。因为,对于某一事件来说,虽然有明确的时间属性,但它所代表的问题却有可能是贯穿于历史的。当然,针对不同的问题,时间的长度也会有区别。比如,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间的长度应该直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但若研究金融市场,那么时间的长度就小很多,因为狩猎社会不存在金融市场,即便是后来的农耕时代,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发育程度也很有限。

更广的空间意味着经济史研究的地域“广角”。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很多学者愿意使用“显微镜”,即通过掌握丰富翔实的史料来对某一细节或局部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当然有助于透彻地理解问题。但除此之外,也不应该忽视“放大镜”的作用,即把更多的材料纳入到研究视野中。这就像照相,善于使用“长焦”镜头的人也应该注意使用“广角”镜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把握问题。从地理空间上,最大的“广角”就是整个世界。当然,并非每一个问题

收稿日期:2017-08-18

作者简介:隋福民(1972-),男,辽宁阜新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都须放置在世界范围内。比如，滨下武志就主要用区域视野来研究东亚朝贡体系。他的区域视野是界于国家视野和世界视野之间的一个经济和文化视野[1]。而沃勒斯坦认为具有结构性经济联系和各种内在制度规定性的、一体化的现代世界体系是考察16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唯一实体。总之，选择多大的空间研究，依赖于所选择的问题。

"广角"这一学术传统在历史研究领域实际上是源远流长的。希罗多德(Herodotus)所写的《历史》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包含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写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古代中国，也包括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至于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则把视域扩展至整个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以"全球史"的气度回顾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则有加州学派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学者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来回答中欧发展道路有所不同的问题[2]。

随着视野的扩大，研究问题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也就不应该拘泥于历史学方法。因为仅仅依赖于一种理论或方法不足以对"大历史"范围内的材料进行合理取舍和辨析，也不足以让有限的历史材料生发出更多和更鲜活的意义。笔者认为，如果要运用"大历史"的视野，那么在研究中就要尝试应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才能发挥"大历史"的"以史为鉴"的作用。王国斌(R Bin Wang)在《转变的中国》中，就运用各种学术理论，来完成中西比较研究，并找出双方在近代经济中的"异"和"同"，从而打消了中欧道路具有一致性的念头[3]。

三、对"大历史"可能引起的质疑的讨论

"大历史"会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通过史料重构历史本身就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即便是针对某一地区在某一时间段的历史，如果能够研究清楚都非易事，资料浩繁会耗尽研究者的绝大部分精力。浩繁的资料需要比对、求证，然后梳理出主要脉络。如果扩大视域，即把目光投向历史的遥远过去，或扩展至整个世界，我们能把握得了么？笔者认为，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忧。正如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样，历史也可以做这样的分工。宏观历史侧重于从"大历史"视角分析宏大问题。这样，有些细节和局部的材料在"大历史"研究中可能就会被忽略掉。

牺牲细节或局部的材料会对"大历史"的研究有损失吗？笔者认为，如果驾驭得当，不仅没有损失，还会有收益。因为在忽略一些材料的同时，可以有两个收获，一个是将更多和更有价值的材料纳入了视野；另一个是研究者不必淹没在细微浩繁的历史资料中，从而可以让自己有更远的眼光和更宽的视野，从而有更清晰的头脑②。

对"大历史"的质疑之二是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理论和方法不能优先于历史，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就会用爬梳历史资料替代了对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实际上表现了一种对理论和方法的不信任。笔者认为，理论和历史的关系没有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土壤，但没有理论和方法也不能对历史进行有效的梳理。对于经济史来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这一说法没有问题，但经济史研究完全可以尝试采用经济学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也产生于经济发展之历史。当然，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并非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但经济学理论也不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倏忽而逝的理论。在分析人类行为时，它的时效性是相当长的。从经济史学史上看，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性的不乏其人。比如，阿什顿(T. S. Ashton)认为，"(历史)资料并不戴着标志内容的袖章……即便是有经验的史学专家，也需要一套大致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取舍选择标准……正如渔民需要用一张渔网来区分那些捕去出卖同让它留在海里的鱼一样。但这张网必须成于专门网工之手，而不是随意编织的织物。编织'经济史学'这个行业的专用网的人就是经济学家。"[4](P346)

还有一些研究者担忧跨学科研究是否可行。这些学者不排斥理论和方法，但是心存疑惑。因为，如果采用更多的理论和方法，那么就意味着对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甚至于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这难道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吗？笔者认为，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但这个挑战并非是不可逾越。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经济史学者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也像本行那样游刃有余。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所有学科领域的专家。但是，通过目前的网络条件和知识成果来掌握一些其他学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科的知识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并非难事。因为，各个学科的专家都撰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普及读物，这些著作概括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③。

四、“大历史”的价值

首先，“大历史”视野使回答历史宏大问题成为可能。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④对此很多学者都依据“大历史”给出了解释。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通过比较欧洲与其他社会认为一些文化上的特征，比如理性、严谨等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5]。与其观点相类似的还有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等学者⑤。还有的学者通过比较倾向于用欧洲的自然环境特点来解释欧洲经济发展道路的与众不同，比如琼斯(Eric L. Jones)[6]。诺思(Douglas C. North)和托马斯(Robert P. Thomas)则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兴起的关键[7]。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对中国落后给出的解释是“高水平的均衡陷阱”。与强调欧洲优越性的研究视角不同，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强调了欧洲通过战争、掠夺和剥削来发展自己的特征。比如，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16 世纪兴起了一个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欧洲完成了对其他社会的剥削，同时让那些社会处于边缘[8]。当然，无论是对欧洲进行正面解读，还是反面呈现，这些解释都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思维。有很多学者同样是采取“大历史”的视野，得出了非欧洲中心论的解释。针对世界体系理论，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为如果存在世界体系的话，那么这个体系就不是 16 世纪才形成的，而是早就存在。欧洲正是搭载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列车才展露出头角[9]。彭慕兰等学者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同时期相差无几。欧洲崛起所具有的特征中国也有。只不过欧洲在资源分布上具有“好运气”，从而使得欧洲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即工业革命出现于欧洲仅是一种偶然[10]。

这些解释正确与否，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因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在此，我们只是强调，这些结论都是借助于“大历史”视野才完成的。只有通过“大历史”视野，才能对欧洲与中国的文化、环境、制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分工程度等进行全面合理地比较，从而发现中欧异同，也才能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或者是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等给出针对宏大问题的理解。

再比如，人类发展与气候变迁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我们习惯上认为，全球变暖是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的结果。然而，全球变暖是否就真的是人类所造成呢？如果将视野拉长到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可能就会发现，气候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竺可桢综合运用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气候变迁历史做了研究[11]。根据他的研究，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约比现在高 2℃；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 1－2℃，每次波动的周期，都约在 400 年至 800 年左右；而且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在此基础上，葛剑雄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气候变迁历史作了进一步的探讨[12]。其结论是，在以往的四五千年间，中国的气候发生过多次波动，出现过几次由暖到寒、由寒到暖的变化。另外，商代后期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也就是说，从中国气候变迁史的角度看，最近一百多年间的变化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据此研究，可以发现，所谓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世界平均气温升高的说法值得商榷。

即便是不研究宏大问题，“大历史”视野也是有价值的。有些学者倾向于在局部或细节研究上精耕细作，这是历史研究必要的功课。此时，若进行历史解释或分析，则仍需“大历史”视野。因为，在经济史学科中，像其他所有的学科一样，如果要理解细节和局部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则必须要有超越局部和细节的眼光，必须要构建宏大的背景。很多学者认为，当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细节和局部就会说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的思维才会给这些细节材料以声音。而我们的思维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具有“大历史”的视野。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所强调的“以小见大”，实际上也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季羡林研究《糖史》的思路就是“以小见大”。虽然季羡林以“糖”作为研究的主题，但他的视野绝不仅仅限于“糖”，而是借助于“糖”，阐述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在蔗糖这样的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13]。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LeRoy Ladurie)的《蒙塔尤》也是“以小见大”研究的典型。他虽然仅仅讲述的是公元 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的历史，但他没有把视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野局限在这个小山村[14]。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即对历史进行细微研究（“以小见大”）与历史学的碎化不是一回事。所谓碎化指的是历史研究过分注重信息，而不关注信息背后的结构等内容。这种过分关注信息的习惯来源于兰克的治史思维，即从档案等材料中重构史实。由于材料庞杂，学科不得不做进一步的分工，从而使得历史学科变得狭隘、零碎。但“以小见大”的研究是关注总体历史中的局部或细节，然而不以粉碎历史全局为追求。

第三，“大历史”可以促进研究者主动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从而促进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经济史研究没有唯一好的理论和方法，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一试。百花齐放的局面有利于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进行竞争。这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有好处。新经济史革命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并且为经济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的例子。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路也促进了社会学、人类学在经济史学科上的应用。总之，经济史学科欢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各种各样的研究者，从而让经济史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15](P4)这一想法并非呓语，因为从经济史学史上看，经济史学科本身就有多种学科的血脉。

五、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采用“大历史”视野的可能选择

“大历史”的研究视野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较多，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比如，李中清、王丰在详细考察了1 700年至今三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状况后，利用挖掘整理的大量历史人口资料，说明了中国存在一套有别于西方的人口控制机制，从而否定了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情况的判断[16]。李伯重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认为，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据此，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虚妄的问题[17]。

“大历史”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略显不足。笔者认为，目前，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考如何将“大历史”视野应用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

第一，以周期理论为模型，在“大历史”视野下考察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史，并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关于周期理论有很多种。比如有农业周期理论、实业经济周期理论、强调储蓄－投资过程的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等。但我们在这里更关注的是“大周期”，比如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熊彼特的周期理论、罗斯托的长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和演化经济学者提出的理论以及金德尔伯格的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这些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机制的解释不尽相同。熊彼特将周期变化的力量归结于企业家创新。演化经济学者弗里曼（Chris Freeman）认为技术创新和集群导致了周期性变动[18]。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则强调了主导部门的作用[19]。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认为，国家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国家生命周期演进通常伴随着一个国家内部重点产业由贸易部门到工业部门，再到金融领域的转移[20]。

笔者认为，这些周期理论可以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养料。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是嵌入在世界整体经济发展之中的。作为曾经的世界经济中心，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代表着世界整体经济的新的发展。如果说企业家的创新、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动力的话，那么这些动力在现代中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这些表现能否说明中国正在开启或者并没有开启新的世界经济周期呢？按照罗斯托的理论，经济的腾飞需要主导部门，那么，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其主导部门是什么呢？经历了哪些变化呢？国家生命周期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中国的和平崛起有没有条件呢？中国现在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否是一个霸权或者周期来临的体现呢？如果是，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我们又缺少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第二，以世界体系理论为指导，思考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在布罗代尔“经济世界”理论的启发下形成的。在布罗代尔眼里，地中海世界就是一个具有扩展力量的“经济世界”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阿瑞吉提出了体系周期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600年发展历史经历了四个周期：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到目前的金融扩张阶段。四个周期具有相似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特征，每个周期都经历了特定国家的政府和商业部门在领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首先采取物质资本的扩张然后向金融资本的扩张转化的过程，亦即每个周期都由资本积累的两个显著阶段所构成——物质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扩张阶段[21]。

世界体系理论同样可以赋予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以营养。按照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逻辑，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走过了一条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盛不衰。因此，落后国家有机会后来居上。关键是要成为“生产中心”，这一中心能够让世界资本蜂拥而来，从而让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当然，成为“生产中心”是需要条件的，包括技术和制度组织的创新能力以及政府的组织能力。中国如何把握住世界所赋予的“机遇”，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如何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也值得研究。

第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比较。比较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使用较多。比如，格瑞夫就以 11－14 世纪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了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⑦。纵观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辉煌、落后，然后重新崛起的过程。如果说过去我们把比较研究重点放置在发现中国落后的原因上，那么现在可以把这一重点转化为中国现代经济为什么能崛起？是中国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吗？还是中国古代传统所留下的制度资源起了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选择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的国家可以是 20 世纪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处于崛起时期，随着其经济崛起，它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美这两个国家尽管历史长度不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治理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可以比较的地方。也可以是印度。印度与中国同属于亚洲文化古国，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处于一个数量级。如今，这两个国家都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尽管改革的时间起点略有早晚。中国也可以与日本比较，尽管两个国家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两个国家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上，两个国家的相似性也很大。比如，日本经济崛起依赖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现代中国还可以与俄罗斯进行比较。俄罗斯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产物。中国也是一个转轨国家。俄罗斯经历了十年的动荡，中国则持续发展。对两个国家的政策、经济绩效以及未来发展潜力进行评估比较也是有意义的。近年来，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很多。笔者认为，如果要对中国道路的特点做出明确的认识，自然少不了“大历史”视野下的比较。

小结

本文提出了“大历史”概念，并说明了“大历史”在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价值，同时试图指出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大历史”的可能选择。当然，这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还请方家指正。另外值得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细节和局部的研究。只是强调说明，历史是宏观的，失却了完整的全面的把握，历史便成了撕裂的碎片，不可辨识，混乱一团。细节或局部如果不能被放置在整个历史架构中，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会随之降低。因此，我们在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有“大历史”的视野，这是不可或缺的。

注　释：

① 梁启超曾言：“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笔者赞许梁的说法，而且认为，如果历史研究要达此目的，必须要有“大历史”的视野。

② 黄仁宇是一直倡导“大历史”的，他所得出的看法也不能说没有意义。1985 年，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提出“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观念。他认为，“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在黄仁宇的研究中，他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未能完成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

③ 比如，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著名实验——薛定谔的猫对历史哲学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关系就有一定的启发。

④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被称为“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

⑤ 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提出：“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的因素。”

⑥ 笔者认为，按照布罗代尔的逻辑，古代中国曾经也应该是一个“经济世界”。

⑦ Greif, Avner, " On the Interrelations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Factors. Reflections from Two Late Medieval Societies", i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by Drobak, New York, 1997, p. 64.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何爱国. 滨下武志的演讲：转换历史研究的视角[EB/OL].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35.

[2] (美)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美)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4] 陈振汉. 步履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 Eric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8]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9] (德)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0] (美)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1] 竺可桢. 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J]. 气象学报，1962(S1)；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2).

[12] 葛剑雄. 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13] 季羡林. 糖史[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14]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蒙塔尤：1297－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5] (英)约翰·希克斯. 经济史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6] (美)李中清，王丰. 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

[17] 李伯重.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J]. 历史研究，2001(1).

[18] (英)克里斯·弗里曼，(葡)弗朗西斯科·卢桑. 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新描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9] (美)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0] (美)金德尔伯格. 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1] (意)杰奥瓦尼·阿锐基. 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Big history as inevitabl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y

SUI Fu-min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ion of big history is advocated in the researches over history of economy in response to any possible question. Moreover, the writer illustrates the values of the big history, and attempts to convince Chinese researchers to adopt the perspectives of big history.

Key words: big history; history of economy;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程　慧]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